

# 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sup>①</sup>

彭益军<sup>②</sup>

(山东医科大学 山东济南 250012)

〔摘要〕 较之古代社会,近代山东的医学教育在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医教育由传教士引进山东,并在教会、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发展;传统中医的传授则逐渐陷入困境。教会所办的齐鲁大学蜚声海内外,其医学院实力尤为雄厚,在山东的医学教育领域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出色的师资队伍、严谨的学风以及比较稳固、充裕的物质保障是齐大医学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齐鲁大学 医学教育 教会

〔中图分类号〕 R-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595(2000)03- 0059- (05)

## Shando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Shandong Medical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Peng Yijun

〔Abstract〕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content, form and other aspect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Shandong in modern time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ancient times. The educa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which was introduced into Shandong by missionaries, developed steadily under the promotion of miss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contrary,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dually ran into dilemma. Shandong Christian University, founded by missions, won a name for itself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Medical School was especially well-run and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Shandong.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Medical School lies in its outstanding faculty, strict style of study and relatively stable, abundant financial resources.

〔Key Words〕 Shandong christian university Medical education Missions

山东医学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以降,古代山东医学教育的内容皆为传授中医药学,形式基本上是祖传、师承、自学。其中,祖传囿于家族内部,且多有传子不传女的陋习;师承多系亲友带徒,传授范围亦是有限;自学则一般是指仕途失意的儒者自学成才。这三种形式至今仍可见其余绪。<sup>〔1〕</sup>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了近代社会,山东的医

① 〔收稿日期〕 2000- 05- 30

② 〔作者简介〕 彭益军(1965- ),山东鄄城县人,山东医科大学社科部讲师,历史学硕士。

学教育在内容、形式、规模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齐鲁大学——这座曾名扬一时的高等学府,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齐鲁大学号称“是中国最老的大学”,源远流长。<sup>[2]</sup>它的原始起点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山东,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西方文化渗透活动。如同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传教士们在山东开办了一些教会学堂、医院、诊所,作为辅助传教的重要依托。正是在这些教会学堂、医院、诊所中,后来萌生了近代山东的西医教育,从而为近代山东医学教育领域注入了引人注目的新内容。1864年,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登州(今蓬莱)创办了一所小学程度的“蒙养学堂”——这便是齐鲁大学的摇篮所在。1883年,同样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聂会东夫妇到达登州,准备在由狄氏蒙养学堂发展而来的“文会馆”增设医科。因设备、人员不足,这个计划夭折了。继而,聂会东夫妇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舍,部分用作诊所行医,部分用作教室办学授徒。他们招收了五名学生,采用自己编译的教材,传授西方医学知识。狄考文、聂会东皆是齐鲁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而聂会东对后来的齐鲁大学医学院乃至整个山东的近代医学教育贡献尤多。就在聂会东于登州行医授徒的同时,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的传教士武成献在青州的工作更稍胜一筹。后者于青州开办了广德医院,附设一所医学堂。1890年,聂会东夫妇奉调至济南协助当地教会工作。他们与他人一起扩建了济南东关的一处教会诊所,定名华美医院。次年,由聂会东主持的华美医院医校宣告成立,当年即招生五名(至1902年,该校共有学生四个班22人,皆为男性)。在此前后,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的巴德顺和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章嘉理分别在邹平、临沂的教会医院也陆续附设了医学堂。以上这些教会医学堂构成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前身——共合医道学堂的基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迫于社会进步的趋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倡导“新政”。这对山东的医学教育局面又有所触动。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延请数名文会馆师生协助,在济南创办了全国最早的省级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1904年,山东大学堂更名为山东高等学堂。高等学堂设预科、正科(此正科相当于大学预科,即大专)。学生自预科起分三类编班,其中的第三类便是有志于接受高等医学教育的学生。正科于1905年春开课。<sup>[3]</sup>1906年,官办的济南中西医院附设讲堂和医学堂,分别讲授西医、中医知识。1909年,山东官府决定培养法医(检验吏),将中西医院的讲堂、医学堂合并,改为专授西医的检习所。

在官办的医学教育刚刚起步的时候,教会的此类机构又走上了联合办学的道路,共合医道学堂呼之而出。1902年,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决定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这所大学分为文理科、神科和医科,各科分布在省内不同地区。其中,分处济南、青州、邹平、临沂四地的四所教会医学堂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由聂会东担任校长,算作大学的医科。共合医道学堂起初并无固定校址,其四个年级的学生于1906年集合到济南,而后按时巡回回到济南、青州、邹平、临沂的教会医院上课实习。嗣后,经过多方努力,共合医道学堂的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大楼于1911年4月在济南竣工使用。从此,共合医道学堂拥有了固定的校址和设备齐全的教学医院,教学环境大为改善。

共合医道学堂定址于济南之时,正值清王朝覆亡前夕。总的说来,晚清山东虽出现了若干教会医学堂和官办医学教育机构,但省内广大农村以至州、府、省城三千万民众的看病吃药仍然依靠中医。人们大多相信切脉汤丸灵验,一般并不求助西医药。<sup>[4]</sup>在这样的背景

下,学习西医远未成为青年学子的主要兴趣。

民国建立,山东的社会环境为之一变。“革命和共和国建立的显著影响之一,就是对基督教,对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持开放态度的人大大增加了。”<sup>[5]</sup> 这为教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教会——尤其是基督教教会的教育、医疗机构在民国前期遂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在新的社会氛围中,追求西方新知逐渐成为社会时尚,人们对西医洋药等舶来品已越来越乐于接受。再者,民国各级政府一方面顺应时势,对教会方面多有仿效,陆续兴办了一些采纳西方近代机制的教育、医疗机构,另一方面则对传统中医药学实行了歧视、压抑政策。1916年,山东省立医学校奉北洋政府命令,取消中医课程。校长田丙午在给山东巡抚使公署呈文中居然提出:“《本草》、《素问》为数千年之遗言陈迹”,“持此难与新世界相争逐,只会瞠乎人后”。山东中医界面对困境奋起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中医界人士对通行的西医教育形式有所参照,陆续在省内建立了一些中医学校。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中医无法得到与西医平等切磋、并驾齐驱的机遇。20年代末,山东省政府将全省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视之为非正规教育机构。<sup>[6]</sup>

在西医大行其道的时代,定址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以良好的办学条件赢得各方瞩目。办学规模日益扩大。1914年,共合医道学堂开设了护士班,培养专门的护理人才。次年,护士班扩为护士学校。191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改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过程中,将该校60余名师生转入共合医道学堂,并特资助共合医道学堂15万美元,作为其扩充校舍、购买仪器、增聘教师之用。191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正式建校,共合医道学堂成为齐鲁大学的医科,聂会东出任首任医科科长。同年,在中国博医会(教会医学学术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的安排下,两所教会医学院校——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和汉口大同医校的20多名师生先后迁至济南,并入齐鲁大学医科。此后,齐鲁大学医科在继续充实、完善。1920年,增设了药学专修科。次年,隶属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的医学编译部宣告成立,附设于齐鲁大学医科。1923年,齐鲁大学首次尝试招收女生,将招收范围局限于医预科一、二年级。1924年,又一所教会医学院校——华北女子协合医校的全部师生(五位美籍女教师和两班32名女生)自北京南下,并入齐鲁大学医科。华北女子协合医校的并入,不仅进一步增强了齐鲁大学医科的实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齐鲁大学男女同校之风。齐鲁大学医科于1925年提出报告:“实践证明,男女同校学习医学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我们并没有遇到任何重大而又不可克服的困难”。<sup>[7]</sup> 鉴于此,校方放宽限制将招收女生范围扩至文理科的教育系、医科、医预科、神科,为后来的全面开放作了铺垫。当时,高校中男女同校在山东尚属罕见,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较早的开明之举。同样是在1925年,齐鲁大学为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又进行了一番改革,将医科改称医学院,其他各科亦改称学院。

概括而言,20世纪的20、30年代是齐鲁大学的主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参与协办齐鲁大学的基督教差会不断增加。截止1927年,齐鲁大学“教职员系中、英、美、加拿大四国人士所组织而成,同时且有旧教各宗派参列其间,合共有十三差会共同合作”。<sup>[8]</sup> 众多差会的加盟,使得齐鲁大学与国外的联系十分密切,广为传播了齐鲁大学在国外的声名。20年代中期,齐鲁大学经加拿大议会和政府议准立案,并获得“授予学位及名誉学位之特权”。其医科毕业生还可被授予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承认齐大毕业生的学历,允许其免试入研究院学习。<sup>[9]</sup> 就国内的情形来说,至迟到30年代初,齐鲁大学已是国内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它拥有文、理、医三个学院(由神科改置的神学院于1925年后渐趋独立,

30年代初完全脱离齐大),学生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各个阶层。不过,客观地讲,齐鲁大学的影响力主要是来自其出色的医学教育。在齐鲁大学建校之初,时人便有“其医科非常发达”、“日见兴盛”<sup>[10]</sup>的评价。嗣后,齐鲁大学立足原有基础,一直把医科作为自己的办学重点,一如南京金陵大学之于农科,苏州东吴大学之于法科……。齐鲁大学后期的津贴使用情况可以引为参考:当时,全校每年接受津贴8.5~9.0万美元,医学院分配到的数额能占到40%。<sup>[11]</sup>这种办学思路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自20年代起,由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和各种公、私立学校的竞争,教会人士力主教会教育事业“当以质为主,不以量为荣。力不能及的,当缩小范围。范围已定的,当增添实力”。<sup>[12]</sup>齐鲁大学力保医科优势,使得自身在20、30年代的山东医学教育领域长期居于独占鳌头的地位。抗战前夕,山东省内计有高等医学院校三所:齐鲁大学医学院、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另有中等医校八所(包括齐鲁大学附设护士学校)。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是省内中医界捐资筹办的,1935年于济南正式开学,所用教师均聘请济南中医名流。由于时局动荡,该校在1937年济南沦陷之前被迫停办,前后仅存在了两年。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教师、学生的素质比较整齐可观,保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但其综合实力仍无法与齐鲁大学医学院相比肩。齐鲁大学附设护士学校长期由英、美籍专业护理教师主持,按中华护士协会规定的课程授课,在省内中等医校中属佼佼者。从整体上看,齐鲁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非但在省内无出其右者,在全国范围内也位列前茅。30年代,国内医学界有“南湘雅,北齐鲁”的称誉。齐鲁大学医学院自认“经过不断的发展,在中国境内,虽不敢说是首屈一指,总算是第一流的医学院了”。<sup>[13]</sup>齐鲁大学医学院向山东及国内很多地方的教会医院输送医生、药剂师与护士。除上海、北京、天津以外的非教会医院,也有不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在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群众的敬重和欢迎。<sup>[14]</sup>

论及齐鲁大学在医学教育方面的成就,人们不能忽视的是:其一,医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发展医学教育需要比较充裕的资金、仪器、图书资料等物质条件。在近代国疲民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山东乃至全国大多数公、私立学校都难以得到稳定、充裕的物质保障。齐鲁大学作为多个差会合办的教会大学,基本上能够做到“经费有定,而源源接济,故所有设施无停辍废置之虞”。<sup>[15]</sup>不仅如此,齐鲁大学凭借其与国外天然的、通畅的联系渠道,在管理体制、教学设施、课程设置、教材选择等方面多接近欧美风尚。虽然这不免使其蒙受“过于西洋化”的指责,但从某种角度上说,齐鲁大学发展医学教育确实具备了较高起点。其二,精良的师资队伍是教育质量的可靠保证。在20、30年代,任教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师主要是由各差会从国外简派而来。他们一般都在国外接受过良好的医学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便具有相当声望,有的则是来华后砥砺自身然后确立了专长。这支师资队伍的业务水平不仅得到了中国医学界的首肯,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美国医学界组织撰写的《西氏内科学》是部权威性很强的医学经典之作。该书的执笔者皆为国际上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便包括三位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sup>[16]</sup>其三,齐大医学院长期保持着严谨的学风和浓厚的学习氛围。学校对学生严格选拔,严格训练。“经过七年苦读从医学院毕业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每年也就几十个毕业生,有时只有三、四人毕业,治学严谨可见一斑。”<sup>[17]</sup>基于此,齐大医学院毕业生中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医学名家。<sup>[18]</sup>

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齐鲁大学医学院共培养毕业生计:医科676人,药学系88人(系理学院主办),药学专修科84人,护士专修科47人,化验技术专修科16人,(下转第67页)

向。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学校应改进诸如人事、职称、报酬方面的配套措施,将教学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适合卫生事业需要的医学卫生人才,体现出医学院校办学宗旨和效益。

综上所述,卫生改革和相关政策法规是完善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其实施必将对医学教育产生影响。适应这些要求和影响,改革现有的医学教育体系是保证整个卫生事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当前我国日益深化的卫生改革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卫生市场,要求我们必须迅速从传统的教育观念中走出来,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卫生人才。

####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Z〕. 国发〔1998〕44号.

〔2〕山东省卫生厅医政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学习材料〔Z〕. 1998.

〔3〕董先雨等. 关于山东省医学教育结构调整问题的调研报告〔R〕. 山东省厅机关调查研究报告, 1998.

(责任编辑:牟进)

---

(上接第62页)化验技士训练班和进修班28人,护士学校159人。<sup>〔19〕</sup>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撤销。此时,山东的医学教育事业已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 〔参考文献〕

〔1〕〔4〕〔6〕山东卫生史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卫生史志〔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 701, 4.

〔2〕王神荫.“七七”事变以前的齐鲁大学〔A〕.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C〕. 1982. (1) 175.

〔3〕李庆胜. 清末民初的山东大学堂〔A〕. 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济南文史精华〔C〕. 济南: 济南出版社, 1997. 227、228、230.

〔5〕〔13〕〔16〕〔18〕陶飞亚, 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318、217、218、225.

〔7〕〔10〕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180、242.

〔8〕〔12〕〔15〕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141、452、446.

〔9〕〔19〕山东医科大学史志编委会. 山东医科大学史志〔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4- 7.

〔11〕〔14〕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M〕. 72、60.

〔17〕王恩芹, 束学山. 重访齐鲁大学〔N〕. 济南时报, 2000- 01- 01(C41).

(责任编辑:牟进)